

创作谈

新作点评

创作《鲲鹏击浪》犹如滚石上山

□马继红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的献礼剧《鲲鹏击浪》,是以毛泽东为叙事主线,讲述他从1918年到1921年,不畏艰难,寻求真理,从一个热血青年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故事。确切地说,这是一部年代青春剧。在以往表现毛泽东的影视剧中,涉及这段内容的作品极少,因此,如何把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讲明白、讲生动,如何把握一百年前那代青年人的精神世界和心路历程,如何让今天的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产生陌生化和差异化的审美观感,确实是一个难题。这部剧我从2019年动笔,直到2022年剧本才审查通过,历时四年,四易其稿,有几次真的写不下去了,甚至想过放弃。如果谈创作体会,那就是四个字:滚石上山。

按照我长期形成的创作习惯,无论写什么题材的剧本,都必须身临其境地去感受,在一呼一吸和聆听触摸中激发创作的灵感。既然是写毛泽东的故事,自然绕不开韶山。于是,第一站我来到韶山。韶山于我并不陌生。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我曾多次拜访过这片革命圣地。当我再一次踏上这片热土,依旧抑制不住内心的澎湃。我沿着老人家的生命足迹,从故居到广场,从展览馆到毛家祖坟,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想,仿佛有一个强大的气场在吸引着。

第二站我来到了长沙,登上岳麓山,俯瞰脚下那逶迤而去的湘江;走进岳麓书院,聆听历史回音壁发出的声响;雨夜中,那尊青年毛泽东的巨大头像与岸畔的霓虹灯光相映生辉,给人无尽的联想。

第三站我回到北京,在喧嚣的闹市中寻找那早已被岁月尘封的三眼井胡同,虽然结果令人失望,但我能幻想当年八个精壮的小伙子挤在一铺炕上,连翻身都要和周边的人打招呼的窘迫。

最后,我来到嘉兴南湖,望着那艘停泊在岸边的红船,想象着当年只有50多人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里开启了惊天动地的航程,心头不由得滚过一股热浪。

完成了第一阶段的采风,我开始沉下心来读书。可惜,能找到反映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书并不多。《毛泽东年谱》上记载的这段历史只有区区6页纸。为了厘清这段历史脉络,我只能采取借鉴的方式,找来陈独秀、李大钊、杨昌济、蔡元培、邓中夏、蔡和森、萧子升、向警予、黄侃、黎锦熙等人的传记和文集,一本本认真阅读。渐渐地,这些人物的活起来,从书里走到了我的脑子里,他们身后的背景也由模糊变得清晰。

在历史的长河中,1918年到1921年这三年时间,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但这期间中国却发生了巨大变化。新文化运动掀起西学东渐的风潮,马克思主义的曙光第一次照进中国,五四运动高举其自由与民主的旗帜,军阀混战的硝烟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在这风云际会的历史舞台上,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各方势力风起云涌,诡异的时局迷雾重重,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如同萧瑟寒风中的一叶扁舟,生死存亡只在一瞬。这不平凡的三年,对青年毛泽东而言,既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蜕变升华期,也是他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的奠基期,所谓“时势造英雄”,毛泽东就是被这黑暗、艰难、复杂、多变的时势造就出来的。

通过将近一年的采风和阅读,我自以为脑



电视剧《鲲鹏击浪》剧照

子装满了,可以落笔了,但真正写起来,依然摆脱不了困惑和艰涩,脑子里想得很丰满,写出来的内容却很骨感,不知写了多少个开头,却始终开不了头……我不得不放下笔,扪心自问,是江郎才尽了?还是遇到了瓶颈?最后我发现,最大的问题还是来自脑子里“伟人”的框框和“英雄”的光环,还是一直以“后人”充满崇敬和仰视的视角在诠释毛泽东。而1918年的毛泽东,只是一个年满24岁、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他是人,不是神,他初到北京,也像众多“北漂”一样,承受着经济的窘迫、他人的歧视、精神的压抑,他在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也对现实充满愤怒,也出现过困惑和迷茫,也因为稚嫩、急躁、冲动做过错事。因此,要塑造一个接地气的真实的毛泽东,就必然要将他从伟人的光环中还原出来,写他作为普通人的意趣和情怀,突出他成长道路上的遭遇,以及他喜悦、愤怒、悲伤、焦虑、无奈等全部情绪。只有这样,才能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作为普通人的毛泽东的个性和魅力,才能让作品充满平民质感和生活温度。循着这个思路,我没有刻意地虚构外在的冲突性情节,而是通过大量戏剧化的细节,制造出一个真实的生活场,使人物接地气、不悬浮。

《鲲鹏击浪》确切地说,是一部群戏。因为塑造毛泽东,离不开他身边的人,无论他的亲人、朋友,还是对手、敌人,都是毛泽东成长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剧中,毛泽东、萧子升、蔡和森的情谊贯穿始终,他们被称为“湘江三友”。最后,毛泽东和蔡和森由情投意合的兄弟,发展成生死与共的战友,而萧子升却由于主义之争,从志同道合合转为分道扬镳,这种变化不仅展现了毛泽东早期思想不断成熟的过程,也是那个时代各种思想在青年群体中激烈交锋的真实写照。此外,我想了毛泽东的父亲、母亲,毛泽东青年时最大的反抗对象就是父亲,同时他深爱母亲,但全剧通过很多细节暗示出,毛泽东的个性

恰恰继承了他父亲的倔强与强硬,这种父与子的关系,具有很强的戏剧张力。

毛泽东的成长还来自同时代的一批风云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等等,剧本以毛泽东为核心,充分挖掘这些历史人物富有戏剧性的性格特征,力图打破单一领袖人物“线性叙事”的方式,他们不仅仅是作为陪衬毛泽东的“绿叶”,而是以“风云激荡、群英并起”的方式,烘托作为主人公的毛泽东!

在创作中,我下功夫最大、着墨最多的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爱情。毛泽东和杨开慧由于家庭出身和成长经历不同,他们实际上是不同的两类人,而爱情往往就产生于差异之中。所以杨开慧没有选择性格温和,从小对她呵护、暗恋的萧子升,而是与豪放不羁、才气横溢的毛泽东擦出情感的火花。杨开慧对毛泽东是爱慕、崇拜、依附,是九死不悔的坚贞,毛泽东是他生命的全部。但在毛泽东的心里,除了爱人,还有天下的苍生,这种爱情关系上的某种不平衡,构成了全剧情感部分最核心的冲突。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爱恋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有误会、有曲折、有摩擦、有争执,最终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的爱是建立在共同理想和信仰之上的美丽爱情故事。

《鲲鹏击浪》表现的年代,虽然与今天已相隔百年,但那个年轻人不怕困难、不畏挫折、不惧牺牲的奋斗精神没有过时,仍能引发当代青年的共鸣、共情,仍能启迪当今青年把逆境中的压力转化为动力;迎难而上,向死而生。

《鲲鹏击浪》讲述的是那个腥风血雨中的青春故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新人,他们的青春靓丽,他们的浪漫潇洒,他们的勇敢无畏,他们那似烈焰燃烧般的热情,他们那把理想看得高于一切的精神,将激励当今每一个年轻的灵魂。

(作者系电视剧《鲲鹏击浪》总编剧)

电影《三大队》: 朝向现实的新警察故事

□宋美琪 张慧瑜

由陈思诚监制,戴墨执导,张译领衔主演的电影《三大队》上映以来,收获了较好的口碑。这部电影在情节上延续了“唐探”系列和“误杀”系列中悬疑感的制造方式,以警察程兵为核心讲述了其追凶十二年,最终完成师父遗愿,解开自己心结的故事。电影通过紧张的追凶情节、缜密的逻辑推理让观众沉浸其中,具有典型的悬疑电影特征。但影片又在此基础上实现了超越,不仅故事原型取材于真实事件,还在人物塑造、背景选取、拍摄视角等方面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

营造真实:非虚构与反类型

影片改编自真实事件,原作名为《请转告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了》,是载于“网易人间工作室”的一篇非虚构作品。非虚构写作是一种带有实践性、创造性的文化书写行为,以文学纪实、生活观察和社会调查为基础,呈现书写者对时代和社会的思考。移动互联网媒体的兴起与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再度掀起非虚构写作的热潮。不同于其他非虚构写作平台,“网易人间”的故事性极强,且更加“基层”与“草根”,其大部分稿件都来自业余爱好者的投稿,此篇作品的作者深蓝原先就任职于公安机关,其大量作品都与刑侦推理主题相关。以上背景无疑为影片奠定了浓厚的现实主义基调。

除了非虚构改编,反类型化叙事也是这部影片的一大特点。反类型电影思潮最初起源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和美国好莱坞运动,在中国体现较为明显的是香港电影,而内地直到1992年张建亚导演的《三毛从军记》开始,才出现了一定的反类型元素。反类型电影最大的特点就是打破常规,而《三大队》在人物设置、情节冲突和影片主题几个方面都体现出了一定的反类型特点。主流类型片常常通过非写实的手法来进行“英雄”塑造,尤其是对于警察这一职业形象,经常是善良、正义、英勇的正面人物的化身,但在这部影片中,三大队的警察们却因冲动而做出有悖于职业原则之事,体现了现实的复杂和多面。在情节方面,电影从警察的视角出发,让观众沉浸在与主演相同的境遇中,经历了程兵的愤怒、痛苦、纠结等种种情绪,而凶手王二勇一直到影片最后才出现,他的美满生活与三大队成员的落魄形成鲜明对比,令人唏嘘。在主题方面,关于“我执”的开放式结局也极具反类型色彩,程兵的执着固然令人敬佩,但三大队的其他成员选择放下过去,重新开始,也未尝不是好的选择。这一设定并未“道德绑架”任何一方,而是给予这一职业更多的理解和宽容。

从“唐探”到“误杀”再到今年暑期大获成功的《消失的她》,可以说陈思诚对悬疑探案故事的演绎已经积攒了不少经验。而在这部影片中,陈思诚却有意识地拒绝了以往类型化和戏剧化的创作方式,进一步向现实主义靠拢。影片基本还原了原作中的重要信息,包括时间线、人物背景和追凶情节都保持了高度一致。而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电影将原作中一个人的故事扩展为“三大队”群像的故事,但最终真正完成任务的还是程兵一个人,既契合了现实,又最大限度地增加了情节张力,呈现出人性的复杂与矛盾,也在对比中进一步突出程队长坚守的可贵。通过非虚构改编和反类型化叙事,影片所呈现的真实感呼之欲出。

新警察形象:现实与奇观的结合

在中国电影中,人民警察的银幕形象极具特殊性。早在1959年上映的喜剧电影《今天我休息》,讲述了派出所民警马天民因热心帮助群众多次错过相亲,最终凭借乐于助人的品质打动相亲对象的故事,塑造了一个“活雷锋”式的社区民警形象。这一形象也成为当时人民警察最具知名度的银幕形象,展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警民一家

亲的和谐景象和社会大团结。20世纪90年代以来,警察形象呈现出两副面孔。第一类以香港警匪片为典型代表,警察被刻画成有勇有谋、无所不能的“英雄”形象,呈现出一种“奇观化”特点。比如1992年唐季礼执导的《警察故事3:超级警察》中,成龙饰演的香港卧底警察陈家驹凭借高强本领一挙歼灭贩毒集团。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好莱坞电影的影响,与“007”系列电影中特工凭借机智勇敢化险为夷、完成任务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处。类似的还有1993年的《重案组》,都体现了一种超级警察的个人英雄主义倾向。另一类则偏重纪实风格,以第五代导演宁瀛和第六代导演高群书为典型代表。他们将警察从所向披靡的高大形象还原到日常生活中,展现出警察也会面临的无能为力。在1995年宁瀛导演的《民警故事》中,外地人口的涌入让民警杨国力的工作难度大大提高,家长里短和邻里矛盾让警察充满无力感。而2012年高群书执导的《神探亨特张》同样通过对真实故事的改编,再现了北京市海淀区一名基层民警的真实事迹,表达了身处社会之中的种种无奈。总而言之,以往影片中对于警察形象的塑造呈现出“奇观”与“现实”的两种倾向。

而《三大队》中的警察形象则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现实主义与英雄主义两种传统的结合。在现实主义层面,原本雷厉风行、神采奕奕的三大队集体陷入牢狱之灾,成为与警察身份完全对立的囚犯,出狱后则从事着基层社会最为普通的职业。如果说身份的转换还不足以打破观众对警察的英雄主义想象,那么三大成员们的中途退出则足以实现警察从“超人”向“凡人”的转变。为了妻子、孩子和健康,他们不得不放弃曾经的誓言和渺茫的希望,成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最令人感到崩塌和幻灭的是师父张青良的“谎言”,这句“谎言”引发了蝴蝶效应,成为三大队员中途退出的导火索,成为程兵坚持追凶的动力之源,也成为狱友阿哲去世的诱因之一。这一情节在原作中并不存在,但影片通过这一转折带来一种“过山车”式的观影体验,也让观众不得不接受身为警察那平凡和普通的一面,而影片中唯一没有破灭的英雄主义,就是程兵在经历了极度绝望和信仰崩塌之后,依然孤身一人寻找并抓获真凶的过程。程兵的形象是一种职业精神的体现,而支撑他走到最后的力量正在于其锲而不舍的坚持。正是这种现实与奇观的结合,让观众在认识到现实的残酷后依然能够选择相信,脱掉警服后的他们依然是人们心中的英雄。

流动在城市:基层社会的显影

影片《三大队》无处不体现着对普通人的关照和注意。除了题材、人物和情节方面的纪实性,影片更深层的现实主义体现在通过勾勒跨越七省的复杂中国地理版图,以及临摹摊主、网管、出租司机等小人物的真实生活样态。片中的三大成员本身并非农民工群体,但影片却通过他们的视角让观众得以窥见进城务工人员的流动性。改革开放以来,进城务工人员可以流动到多种职业,但在城市里,他们的工作具有临时性,完全按照劳动力自由雇佣的市场交换原则,这就使得他们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心理上都很难获得归属感。影片中出狱后的三大队成员们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面临着相似的境遇:为了追捕王二勇,他们不停地换城市、换工作,没有了警察身份的加持,只能通过各种体力劳动来谋求生计。对于很多进城务工人员而言,这样不稳定的工作生活状态正是他们的日常。

进城务工人员的形象甚少出现于银幕之上,因此,影片中看似习以为常的生活化场景,却是商业电影中十分难得的社会显影。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影片无疑提供了一个更具启发意义的社会性视角。

(作者宋美琪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慧瑜系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主任)



由作家虹影执导、编剧的首部电影《月光武士》正在全国公映。影片根据虹影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该片以“山城”重庆为地理背景,讲述了1976年时14岁少年窦小明为住进祖传身而出做她的武士,一生为其守护的感人故事。虹影表示,与以往将重庆作为背景来讲述故事的影片相比,《月光武士》将重庆发展融入电影脉络,实现了“拍重庆”与“重庆拍”的融合。

(许莹)

创新描绘平安中国建设美丽画卷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视协、福建省广播电视局、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电视剧《此心安处是吾乡》专家研讨会在京举行。该剧直面政法题材创作难点,紧扣现实主题与时代脉搏,清晰讲述了平安建设中心作为社会矛盾感知的“前哨”和纠纷化解的“末梢”,推动矛盾纠纷及时就地化解,有效筑牢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的故事。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和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20周年。作为中国视协重点现实题材电视剧剧本创作计划资助作品,《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播出体现了对“建设平安中国”和“枫桥经验”的重视与提倡,是对宏大主题具象化呈现的有益尝试。与会专家谈到,该剧以贴近生活的视角,将镜头对准平安中国建设的基层工作人员,通过丰富的故事情节和演员的出色演绎,让观众看到了一群勇担责任、默默奉献的基层调解工作者,展现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解决矛盾的过程,体现了创作团队较为深远的政治眼光和问题意识。在角色塑造方面,该剧从现代社会的人物关系入手,刻画了基层政法干部的理想追求和底线坚持,由点到面地反映了当代平安中国建设发展的新面貌。同时,专家们也指出该剧存在个别主线剧情不够清晰、对白语言尚需打磨等问题。

(杨茹涵)



电影《三大队》剧照